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六九八）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六六期 ——  
(二〇一二年十月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210a)

---

【劫后反思】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上）	唐 伟
【各抒己见】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自序	徐正全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劫后反思】

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上）

• 唐 伟 •

——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读后

孙怒涛 1960 年从浙江农村考入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文革中曾担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414 总部的二把手，1980 年调离清华。曾表示要写一本《我在清华大学二十年》的书。今年 2 月 22 日老孙给我发来了本《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以下简称《拷问》）。他在首语中写到“写作的过程，是对自己良知的又一次拷问，”“我是写给熟悉我的朋友们看的……，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一个负责的交代。”孙怒涛的书，我看得很认真，也想得很辛苦。因为他书中的重点是写清华文革，这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们今天所写下的一切是给同代人看的，引起同学、朋友的联想，以求史料之真实。但我以为主要是为了给后来人看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都聪明得太迟，而又老得太快，社会总在轮回转圈。

1949 年，有大学学历的中国人只有 10 万。农村孩子的出路只有三条：招工、参军和上大学。老孙的父母亲含辛茹苦供养独生儿子上学，他们的追求和梦想一直是老孙心目中最有份量的嘱托。老孙也的确是一个能读书、会读书的读书种子，家世清白、父母良善，只要不是过于贫困，哪派势力当政临朝他都有得到教育的机会，没有必要特意贬低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把共产党视为恩人，把毛主席当作救星，永生感恩！”记得去年和老孙在北京见面，还谈到他

的故乡慈溪，自他以后这些年，还没有一个考上清华的。

小学入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是老孙父亲的期望，也是他自己梦想的政治前途。我比老孙小几岁，有点政治觉悟也开始于1958年。那一年，中学校园的围墙写上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标语，操场上也垒起了一座炼铁的土高炉，解放前在美国留过学的英文老师晚上站在乒乓球台上，在教育革命的口号声中接受批判……。大饥荒的1960年老孙上了大学，红专辩论、参观反右展览、学雷锋运动、反修教育，孙怒涛平和地娓娓道来，亲切真实，那是我们一代人的共同体验。

“九评学习”成了孙怒涛政治追求的“滑铁卢”，清华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两大法宝：一是政治课和理论学习中的“灌输”，二是政治运动和学习中的“亮私不怕丑”。孙怒涛就因为暴露思想、迎合组织诱导而被绕进了政治漩涡。他在党员、干部启发下，在学习会上谈了“听到的、见到的、心里一闪念的”如基层干部浮夸、农民挨饿的事例，得到了对“三面红旗”认识模糊的组织结论。老孙追求进步之心严重受挫，大学毕业也未能入党。“人，一旦被贴上政治标签，就很难清洗掉，很难再改变。”老孙的体会可谓刻骨铭心。

蒋南翔校长是一个嗅觉敏锐、处事老道的政治家，这位老清华学人热爱党的教育事业，他对清华自有一份特殊的感情，清华看重学习尖子、体育尖子，关爱学生到“护犊子”的程度。他在“院系调整”的政治改革后从团中央到清华任校长，“反右斗争”的胜利，搬掉了原党委书记袁永熙、桀骜不驯的钱伟长，破除了以“教授治校”为代表的英美资产阶级的旧教育传统，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了多科性工业大学的建设和发展。仿莫斯科大学建造的主楼就是蒋南翔在清华工作业绩的象征——宏大本板结。大饥荒缺吃少钱，主楼降低了高度，缩小了规模。尽管如此，主楼已成地标，足以长久地傲视全国高校，既能彰显政府对教育投入的窘况，更是改变了清华的传统，从此尊官重楼：大楼重于大师、高官藐视学人。蒋南翔部长要在学生中培养出副总理的期望自然不在话下。

1965年的夏天，老谋深算的蒋校长一定意识到了什么，从西单大木仓高教部到海淀水木清华丙所，有他频频往返的身影。在“顶风开好万人船”的口号下，他加快了变革的步伐：将65级入学的1649个新生学制改为5年；开办了两个女生食堂；把4、5、6年級的4400名师生调到京郊农村搞一年“四清”，“在三大革命斗争中锻炼三大革命运动战士”；加快了学生中党组织的建设，打破了一般不在一年级发展新党员的惯例；更加密切关注高干子弟的动向，积极发展高干子弟党员……。他是不是想到了：北京城里将再次难以摆下那张平静的书桌了？

1965年9月孙怒涛在怀柔县城关公社白庄大队参加“四清”，一个贫农的儿子在苦寒的农村不会有太多的不适应，他有两大收获：他知道了什么东西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他还知道了同年级的刘菊芬同学是高干子弟，并初步领教了机心难料的刘菊芬的高傲善变。老孙和农民打成一片，努力工作，但是他火线入党的梦想依然落空了。

如孙怒涛所言，1966年6月1日全国广播的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大幕。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只有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蒋介石没有做到的事情，毛泽东做到了。他老人家延安整风以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从批判《武训传》，向已死的陶行知开刀，批判胡适思想，批判胡风集团，经过“反右”运动大规模的整肃，中国知识分子已有别于社会的脊梁和良心，他们失去了受人尊敬的地位，再也不敢奢谈体面，若没有“单位”收留，甚至失去了养家糊口的生活基础。毛泽东攀上了超过秦始皇一万倍的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君临天下，天威难测。他再也不会犯错误了，因为他会用更大的错误掩盖以前的错误。他永远不会失败，因

为所有的失败都由党、国家和人民承担。党、国家、人民绝不会相信并接受毛泽东会失败的各种事实。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我们的所有成绩，都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取得的；我们所有的挫折，都是毛主席的思想、路线受到干扰的结果。林彪强词夺理，却符合群众的良好愿望，迎合了领袖需要。于是毛泽东的胜利接着胜利，而我们得以长久地生活在“幸福的”毛泽东时代里。

“春江水暖鸭先知”。最早向清华党委贴大字报的是刘涛、贺鹏飞等高干子弟。绝大多数同学和孙怒涛一样，“感性上的保蒋和理性上的怀疑蒋一直在纠结着。”感性来自于个人的体味，理性来自中央对北大的说法和类比分析。蒋校长和老师们的没有理由怨怼自己的学生，除了那些自以为拥有“丹书铁券”可以为所欲为的纨绔子弟，独立思考的传统和谨言慎行的作风，在急风暴雨的狂涛中仍在发挥作用。清华师生从来没有抛弃过理性思考。早在1966年春节，清华党委内部就有“两个中央”的小道消息流传。党委副书记刘冰在5月的晚风中从北京饭店开完市委工作会议，骑着自行车返校，在经过塔院的路上心乱如麻，他有着与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完全不同的心境：革命，真的革到自己头上了？周恩来访问归国，在毛泽东那里弄清了那个“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不是自己，才放下心来步步紧跟。只要野火还没有烧到自己身上，刘、邓壮士断腕，得力的干部彭真、刘仁、蒋南翔惨遭抛弃。随着彭、罗、陆、杨被打倒，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的北京市委顷刻瓦解。蒋南翔在高教部被揪出来了。新市委派出的工作组进入清华，清华党委领导立马成为“黑帮”。上级组织的无情无义造成了文革的第一波灾难，群众从来没有贪天之功为己有，上级组织有什么理由要把打倒各级领导的罪责算到“造反派”头上？

偶然创造历史。6月的一天，自控系63级樊程在主楼前值班巡逻，一辆轿车停在校门外公路边，一位身着中山服、个子高挑的中年女干部，骑上后备箱中搬出来的自行车，从主楼前进入清华。这个女干部就是工作组顾问王光美。从此清华文革就和中南海内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结下了剪不断、理还乱的缘分。出于偶然，王光美原拟与化902班同学座谈未到，替代她的女同志或许没有说明身份，事后受到蒙骗的蒯大富贴出大字报，质问“叶林同志，这是怎么回事？”恰巧这天，蒯大富在刘才堂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有关夺权的批语。工作组如临大敌，开启了对刘才堂、王铁成、蒯大富等人的斗争。因为蒯大富在班上有个支持他的“十人小组”，工作组认为是群众基础；因为蒯大富是校刊通讯员，他学习毛著的照片上过1965年的《人民画报》，工作组怀疑他是清华党委埋下来的炸弹。为了“枪打出头鸟”，“反蒋必先反蒯”。仍是偶然的自作聪明，王光美到学生食堂和工友一起为学生打菜，这是一次精心安排的国家主席夫人亮相。但清华不是桃园大队，知识分子一眼看出这只是王光美令人反胃的作秀。她在清华从此名声不佳。

在工作组的淫威下，校、系、年级、班有组织地将“蒯派”清理出来搞臭：取消这些人的行动自由，禁止他们写大字报，私拆他们的信件，没收他们的日记，逼迫他们写交待材料并加盖手印，甚至监视居住。就这样在全校师生中硬抓出了500多个“右派学生”，硬整出了一个“蒯派”，硬逼出了三条命案。1957年“反右运动”的场景，再一次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巨大的压力下，要么窒息而死，要么爆发而生。清华已经成为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所有的“蒯式人物”统统缴械投降了，纷纷和老蒯划清界线。在绝望中绝食的蒯大富，悄悄被人看顾，来人自称受到江青同志委托。老蒯久旱逢雨，停止绝食，有了生机和继续战斗的勇气。

## 一、关于“八八串联会”

“八八”的目标是批判工作组的错误，作用和意义就在于它是清华第一个群众自发的对抗上级指定的“临筹”的组织。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论述，只是政治家们鼓惑群众的借口和驾驭群众运动的手段。共产党最忌讳有组织的行为，自外于共产党的组织是不会得

到信任和支持的，它的最好的结果是自生自灭。一个共产党员可以犯政治错误，但决不能犯组织错误。“八八”组织松懈，各系负责人联席会议是最高决策机构。唐伟、陈育延、吴栋等几个头面人物，也只是凭着父辈是革命烈士、革命干部；本人都是预备党员，自以为“辫子”较少，能在“血统论”肆虐的环境下与“临筹”的高干子弟过上三两招。工作组也非等闲，大辩论、讲道理输了，搞外调、查三代是他们的拿手活。清华派出的外调人员到重庆渣滓洞查敌伪档案，整了一堆唐伟父亲是叛徒的“黑材料”回清华。工作组撤得太快，这些没用上的“黑材料”工宣队用上了：唐伟在“清队”中被关进“可教育好子女学习班”，背着“叛徒子女”的档案材料分配青海。“八八”的纲领很低，只求清算工作组在清华50多天里犯下的错误，只求所有无辜的师生和自己不要被打成反革命，“八八”派并不认为“夺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949年以后大陆政权不是一直在共产党手里吗？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普及毛泽东思想的思想大革命吗？因此完全没有一点夺权接班的思想觉悟。随着工作组撤离，刘、邓垮台，刘邓路线遭到全国、全党、全军批判后，“八八”的头头就失去了追求，迷失了方向。

孙怒涛认为：“八八”如果真的要彻底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都是好人”，“还应当承认蒯大富和蒯派与工作组的斗争是最勇敢最坚决的，他们就是革命左派。”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这种非黑即白的决定论说法都难以站稳脚跟。居高临下的“平反”，从来是权力部门的一出戏，“八八”掌过一天权吗？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哪个左派是自封和举荐出来的？毛泽东称蒯大富为“五大领袖”，他能领导近半师生员工的“414”吗？毛江夫妇不是在他们去世、下台N多年前，就无情无义地将老蒯抛弃了吗？老孙曾咨询过我，老蒯未能加入“八八”的原因和经过。我将经过告诉了他，还说：老蒯不诚实有目共睹，他宣扬的“权经”遭人反感。但《拷问》中仍写道：“鲍长康问：蒯大富能参加‘八八’吗？答复是：他不行。于是讲义气的鲍长康说，既然你们不要蒯大富，那我也不参加了。”1966年8月23日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支持他拉起自己的红卫兵队伍。老蒯加入“八八”只是试探能否控制“八八”。至于说到鲍长康的“义气”，我真为老孙既无事实又无原则的吹捧深感脸红。鲍长康聪明好学，是“井冈山红卫兵”的发起人之一，是兵团总部的二号人物。看了李自茂回忆“5·30”的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是清华武斗中团派的第一线总指挥；看了韩爱晶写的回忆文章，应知道鲍长康手上不仅有伤亡同学的鲜血，更有工宣队员、军宣队员的鲜血。鲍长康量窄器小、锱铢必较。工作组“反蒯”，他投降了；老蒯绝食抗争的时候，鲍长康的义气哪里去了？前年老蒯在太原突发中风，一同驾车出游的鲍长康借口上海家中有事，不能留下照顾老蒯，第二天却带着一帮人上了五台山。是冶金系6字班的王文鼎为老蒯夫妇买了机票、送上回深圳的飞机。老孙还能讲出几件鲍长康讲义气的事情？

《拷问》还写到：唐伟“在为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的同时没有为蒯大富等蒯派进一步平反，这是很遗憾的。我真为唐伟可惜了！他错失了一次站在文革潮头、引领清华文革、掌控运动领导权的极好机遇。”写到这里的老孙，头脑未必清醒：“旗手”江青只敢承认自己是条老毛让她咬谁就咬谁的“忠狗”，老蒯说自己“想做奴隶而不可得”。比起那些奉旨造反、投机造反的人，唐伟只是个跪着造反的学生。唐伟当时说过：“宁可右倾，不当阿斗。”他是糊涂啊！

## 二、关于“血统论”

1962年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为了分清敌友，实际工作中执行着一条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土改时，由新政权派出的工作队根据每个家庭解放前三年的经济状况而定。其中难免错划和偶然的因素，时代和社会造成的贫富悬殊被指控为个人行为，犹为荒唐处是一次定成分就万劫不复、殃及子孙。毛泽东终其一生不懈怠地奉行井冈山当“山大王”时的杀富济贫，并乐此不疲。人为灾难不断，举国难安，内斗内耗无休无止。阶级路线中的“重在政治表现”只是留给掌权者解释、定性和灵活掌握、生杀予夺的借口，也成了“政治犯”由来的依据。

1966年8月的一个晚上我和“八八”的几个头头第一次被周恩来接见，在人民大会堂他谈得最多的是自己的身世：我出身在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到父亲一辈破败了，我父亲只是个小职员。青年历史学家戚本禹同志对我说、你的家庭出身可以填职员。我还是填官僚地主家庭。我出生于剥削家庭，我入党时就填写的官僚地主家庭出身，为什么现在要改呢？你们能因此而说周伯伯就不革命了吗？有人劝我也改个名，我周恩来在受到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的时候也没有改过名，为什么现在要改呢？我们政协有一个老先生，“五四”以后为了表示和旧社会一刀两断，不要姓名了，叫“无名”，别人叫的时间久了，他的姓名成了吴铭。我今天提到他只是为了说明革命不革命和姓名、和家庭出身没有关系，你们可千万不要去找吴铭老先生的麻烦啊。

他还谈到，为了给铁路让道，搬迁周家祖坟的事。他说自己1949年后再也没有回过淮安祖籍，回到老家见不见那些破落地主家族的亲戚长辈？不见不好，见了之后会不会给当地政府和群众造成压力？当地政府曾报告将我的祖屋修成“周公馆，”我没有同意，我对当地政府干部说，我真是从那间屋子里生出来的？你们若要坚持修“周公馆”我也只好同意，但是你们必须在门前挂上我写的一段话：这是一个罪恶的剥削家庭，这个家庭出了一个不肖子孙周恩来，他背叛了这个家庭，走上了革命道路。你们若是同意挂上这段话，就去建“周公馆。”……

家庭出身不仅阻断了许多普通人参军、招干、升学，甚至嫁娶的生活出路，而且也让贵为总理的周恩来深深地心存忌惮。邓小平也从未回过老家，广安协兴乡传出一句话：“龙归大海不回头。”真实情况邓家是土豪。只有厚黑如毛，才会把富农家庭成分改为中农。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自于阶级斗争学说。“血统论”是这个错误理论开出来的“恶之花”。谭力夫鼓吹“血统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和“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口号也传到了清华校园。高干子弟大多持支持态度，以此作为仗势凌人的依据，他们象被打鸡血一样亢奋。一些早就想着攀龙附凤的农村学生，可悲地充当了抄家整人的打手。前些日子在1964级校园网上，读到了贺鹏飞班上一位同学的回忆文章。当年他热切地盼望成为贺鹏飞的同班同学，跟随贺鹏飞，他幸福地参加了“8·18”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盛典；他还参加了“8·24”的行动……。四十多年后他依然沉湎在铁杆粉丝的疯狂激情里，一遍再一遍写到：“王子永远是王子，贫儿永远是贫儿。”这种农村版“血统论”耸人听闻，这种顽固的愚昧或许是清华教育深层次的悲哀。

清华历来看重学习成绩、体育成绩，平时高干子弟也行事低调，注意搞好同学关系。1963年贺鹏飞高考落榜，贺家也只是通过荣高棠找到蒋南翔，让贺鹏飞到清华附中补习。第二年贺鹏飞作为体育尖子（北京市中学生铅球比赛第一名），根据规定降50分被录取到机械系。在“血统论”的煽动下，在工作组的讨好下，在权力和荣誉的诱惑下，不少“红五类”子弟晕头转向了，丧失了理智。“血统论”对于青年知识分子的伤害深重而久远，可是首先受到伤害的却是鼓吹者自己。

### 三、关于“8·24”

“清华大学红卫兵”是清华大学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它是在刘菊芬的“自控系红卫兵”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它有一个抱团的群体，带着高傲和神秘。它有一个以高干子弟作为核心，吸收了多数中央候补委员以上、少将军衔以上、省部级干部以上的子女“拚爹”排座次，“红五类”子女为侍从、为拥趸的豪华阵营。这帮“听话的好孩子”，习惯了保姆的教导，王光美说，他们成立了“八八串联会，”你们就不能成立“八九串联会”？于是清华就有了“八九串联会。”“8·24”行动也是在王任重指点下搞起来的。他们大权在握、体面光鲜、思想贫乏、毫无创意，他们的大字报除了泄露上层斗争的动向，就是暴露上层斗争的隐私。“8·24”行动是

他们唯一的一次壮举。

“8·24”行动是一次欲盖弥彰的闹剧。1966年8月19日清晨，唐伟、吴栋、陈育延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内的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中午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雷蓉、王小平、王新民、袁塞风等高干子弟跟着贴出大字报《三问王光美》。8月21日刘涛贴出《誓死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高干子弟带动下，矛头对准王光美，公开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校外赶到清华看大字报的人也越来越多。“8·24”傍晚，贺鹏飞等人在王任重的提点下，召集了十二个院校的红卫兵拥进清华，撕毁了主要是他们自己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的大字报。为了掩盖他们不光彩的政治行为，他们打着“破四旧”的旗号，喊着“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口号，推倒二校门、抄家、抓人，把“黑帮干部”、右派教授关到科学馆、二教毒打。

以下摘自罗征启老师文章《被遗忘了的“红色恐怖”——记1966年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2008年8月20日修改稿）：

8月24日晚上，……几个人把张慕津架到审讯室，我刚想看一下，就挨了一下抽打，“不准看！”我就听审讯室里很重的抽打声音和张慕津的呻吟。过了一会一学生从审讯室里出来，大声说：“张慕津想逃过群众的专政，被我们抓到了，现在他就要从审讯室爬出来……”这以后，走廊的南端又传来一阵喧闹，原来是几个手执皮带、木棍的人要党办主任何介人和宣传部第一副部长林泰两个人对打！我听到喊声：“使劲！”……我心理难过极了，这是我们的学生吗？怎么会这样！接着审讯室内忽然传出一声呼叫：“贺鹏飞来视察了！”几个人走出审讯室到楼梯口迎接。我们正躺在水泥地上，“快起来，跪好，低头，手背在身后，头距离地面15公分，不能超过20公分，也不许顶在地上。快！”刚刚“整理”好，贺鹏飞就上来了，我还来得及偷看了一眼，果然很象贺龙元帅，脚踏大皮鞋，手提一条皮带。审讯室里的人象是汇报什么。贺鹏飞从我面前走过时看见我因为支撑不住他们规定A姿式，已经把头顶在地上，他就用皮鞋踩我的头，并且厉声说：“不许顶在地上！”他这一踩，我头上已经结了疤的伤口又滴下许多血。……我被带回生物馆，从昨晚搬运二校门的垃圾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一口，可以说是饥渴交迫。这时由几个“革命群众”押解，几个“黑帮分子”到教工食堂取回吃的……黑帮分子们排成一排，一个学生在前面训话：“你们要吃饭吗，那就听好，你必须说：‘臭黑帮王八蛋崽子狗崽子x x x感谢毛主席给饭吃。’听清楚了吗？试一下。”第一个是钱伟长教授，他说完了那段侮辱性的话语以后，那个学生又喊：“你还得加一个‘大右派’，重来！”于是钱先生又来一遍，加了一顶帽子，领了口粮，站在原地等候。这时我认出这个学生好像是工程化学系的，以后工化系的辅导员告诉我，他姓杨，是个大个子。“第二个！”他喊。第二个是我，我没有加多什么就过了关。第三个刘小石，也过了关。第四个是行政处长李思问……。下午，又有了新花样，一个叫马楠的学生带了两个“随从”，来到生物馆，审问我们这些人。听说这马楠是军人后代，绰号叫“马楠将军”，到处打人抄家。第一个叫走了钱伟长，……过了一会钱伟长回来了，我看他后背被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忘了是第几个，叫到我。我走进审讯室，马楠嘴里叼着烟卷，两条腿放在桌子上，十足一付兵痞模样，一边站着一个瞪圆了眼睛的大汉……

罗征启讲了这样几件事：(一)“8·24”是一起卑劣的政治事件，领头的干部子女要毁掉的是他们在巨浪突袭晕头转向时贴出的揭发自己父母的大字报。为了掩盖其政治目的，他们打着“破四旧”、“只许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的口号，推倒二校门，四处抄家，毒打“右派”、“黑帮”，以转移群众视线。(二)张慕津、罗征启、钱伟长等人肉体被殴打，人格遭凌辱，而凶手是他们的学生、我们的同学。罗老师文中点到的贺鹏飞、与我同系同年级的杨同学、水903的马楠等人乖戾凶残的整人手段和电影中的坏人毫无两样，谁能相信他们只是二十出头、大学低年级的学生？几十年过去了，我从未听说过他们有过任何忏悔和道歉。他们当年的恶行和至今无悔的厚颜，将自己的人格污点越搞越大，这种自作孽行径，已将自己变成了清华历史上永

驻难改的地痞流氓。

时任北京新市委二把手的吴德，在他的回忆书中竟然指认蒯大富是清华“8·24”的肇事者。那些说违心话保官、有了权就栽赃的“老革命”们，我要对你们说一句：“我鄙视你们！”如孙怒涛所言：“恐怖、即使披上红色的、革命的外衣，也涂不上正义的色彩。”

#### 四、关于蒯大富

谈论清华文革，蒯大富是绕不过去的话题。蒯大富是江苏滨海一个贫农家的孩子，1963年考入清华工化系902班。在工作组的高压下，可以看出他的执着和坚韧。他在大礼堂前和以势压人的薄一波辩论，展示出了他的机敏和口才。蒯大富在“反蒯”斗争中的表现可圈可点。我曾在给周泉纁的信中说：这是一个20岁的青年学生的骄傲，也是清华大学的骄傲。蒯大富有政治追求，又受到校党委的重视，为什么到大三还没入党呢？保定要宝忠写的《蒯大富传》中讲：一次老蒯的父亲来校看他，他却对同学介绍这个苏北老乡是村里人。后来，我们大一辅导员上党课时讲，有的同学“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让我特别反感并心生警惕的是不断传来的“蒯氏权经”：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谎话越大相信的人越多，谎话的作用在于它被戳穿之前目的就已经达到了。后来陈育延对我说，“蒯氏权经”有二十多条。

孙怒涛的《拷问》中说：“如果‘八八’真的能承认蒯派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并把依旧处于困境的蒯大富收罗麾下，我想蒯大富对‘八八’会心存感激的，蒯大富也不见得非另立山头，拉出一个‘井冈山红卫兵’来不可。”老孙如此分析和真实相差甚远，连蒯大富自己都不会相信。老蒯好大喜功的虚荣心，在文革的特殊环境下很快转变为权欲野心，在江青、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下很快迷失了自己的本性，走过了一段疯狂的夺权道路。

1966年9月24日“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成立，它的发起人是蒯大富、鲍长康、彭伟民，选中井冈山这个名称的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小女生，十六、七岁的刘刚，她后来成了蒯大富的恋人。“八九”红卫兵分崩离析，“红旗”、“延安”等红卫兵和“红教联”等群众组织纷纷成立。但“井冈山”的成立是有背景的，它的背景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井冈山”的目标明确：批判工作组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八九”、为蒯大富彻底翻案。尽管如此，井冈山的人数在“三总部合并”前也只有数百人。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在9月底分裂为“八八总部”和“临时总部”，分裂的原因是在打倒刘、邓后，继续革命的方向方式方法上。“八八总部”认为“井冈山”批“八九”是矛头向下，不符合“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和“革命不分先后”的《十六条》精神，所谓为蒯大富革命造反精神彻底平反，有泄私愤和树立个人权威的苗头。“临时总部”认为斗黑帮是大方向，重点批判蒋南翔和清华党委代表的资反路线；“八八总部”认为重点是批判王光美和刘、邓为首的资反路线。但周恩来特别告诫过：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所以主张向中央请示、听中央安排。井冈山主张彻底为蒯大富和“蒯派”翻案，其思想基础发展成为“大翻个儿”的口号和“理论”。越来越多的学生对校内派系斗争厌倦，对运动发展茫然，纷纷外出“大串联”。

蒯大富篡夺清华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的领导权，既是文革乱象，更是中央文革支持的结果。

“三司”的全称是“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在全国夺权斗争高潮叠起的1967年，打着“三司”旗号的一个红卫兵小分队，就能在一个省或市里掀起巨浪狂涛，蒯司令的一个电话就能决定一个省地级干部该保或是该反。明明是“二司”的“北航红旗”，因为韩

爱晶和蒯大富的亲密关系也在全国各地设立“三司联络站”。时任总理办公室主任的童小鹏在回忆文章中错误地写到：“早在八月下旬，红卫兵在大中学校兴起，并逐渐联合起来。由于观点不同，大学分为第一司令部和第二司令部，中学则以‘西城纠察队’为主成立了第三司令部。”真实情况是这样的：“8·18”后不久，清一色的干部子女红卫兵联合组成了“一司”，政治观点不重要，父母级别和相互关系才是重要的。清华“八九红卫兵”参与组建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后来被称为“一司”。一部分没有被邀请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不愿意了，联络了另外一些红卫兵组织准备成立“二司”。戴维堤、韩爱晶为头头的“北航红旗”，朱成昭、周永璋、王大宾为头头的“地院东方红”和“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都在“二司”筹备人员的邀请之列。政治观点不重要，凡未参加“一司”的红卫兵组织均可参加“二司”。1966年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和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后，地院周永璋找我商量，两校牵头找清一色反工作组的红卫兵组织成立第三个司令部。“北航红旗”是保工作组的，留在了“二司”，这也是后来“天派”、“地派”由来的原因之一。“三司”成立之初，只有14个院校，以“清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地院东方红”人数多，又是发起单位，1966年9月5日“三司”成立，地院和我们派人出任了正副总指挥。国务院将几个红卫兵的司令部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其中一座大殿就是“三司”的司令部。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曾经给我们当了几天顾问。1966年10月6日发展壮大了的“三司”，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蒯大富由中央文革点名作为红卫兵代表在会上发言。那时“井冈山”还未加入“三司”，它加入“三司”是清华“三总部”合并以后的事了。

“井冈山”的历史使命明确而简单，就是充当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三司”是各校红卫兵派驻人员组建而成，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靠边，国务院副秘书长、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受惊吓而自杀后，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不断减少，尽管他精力旺盛、勤勉有加，但也会力不从心。国务院设在西安门大街22号的红卫兵接待站逐渐被中央文革渗透和掌控。蒯大富掌控“三司”应在清华“三总部合并”前夕，因为那时清华派驻“三司”的代表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八八总部”的二把手陈育延。

1966年12月周恩来、陶铸、江青等中央首长多次讲话，要求各校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师生员工大联合的呼声也很高，头头们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主动找到老蒯，表示放弃争一把手，都用“井冈山”的名称，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井冈山”、“八八总部”、“临时总部”各推举9、7、5名总部筹备委员。就在达成协议的第二天（12月19日）清晨，蒯大富派人突然强占了“八八总部”控制的明斋广播台，单方面公布了20个总部筹备委员的名单。孙怒涛在《拷问》中写到：“在‘井冈山红卫兵’里，总部核心主要是那些与蒯大富有过共同患难经历、并且开始就参加了‘井冈山红卫兵’的蒯派人物。其中有好几位都是蒯大富同班或同年级蒯派。这些人这次都被蒯大富推荐上去了。”“我被蒯大富提名为总部委员，这是我不曾想到的。他事先没有给我透过口风，我也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从老孙的回顾中，能看到是“三总部合并”吗？那是蒯大富私自任命干部，拉帮结伙。当时有几个造反的头头在乎程序正义、手段光明？对蒯大富的卑劣行径中央文革却没有任何干预，我甚至猜到，其中有戚本禹的共谋。清华文革已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大辩论时期了。几天后我和朱德明、许胜利宣布退出了“井冈山兵团”总部筹备组。

“蒯司令”获得了“三司”和“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权力，他的造反精神更足了，更加狂妄了。毛老人家正在部署迎接“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自然乐于见到几个如同蒯大富一样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将专干“脏活”，以搅乱天下。全国学校已停课半年，“大串联”、“长征队”、千多万红卫兵参加“北京朝圣”……工农业生产已受到严重影响。为了把人们心中最强烈的欲望和最狠毒的仇恨煽动起来，毛统帅号召全国大夺权。权、权、权，命相连。且看蒯大富的突出表现：



## 1、反刘少奇，手段卑污

“12·25”行动，是“三总部”合并后“井冈山兵团”第一次大行动。6000余名清华师生打着横幅游行，在“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中，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满了长安街。十月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但还是中央首长。1966年12月31日晚上，周恩来把“井冈山”的头头召集到人民大会堂。虽然我已经退出了总部，蒯大富仍然通知我参加了接见。周恩来明确表示不支持“12·25”行动的作法：“你们把‘打倒刘少奇’的标语贴在北京街头，我如何向外国朋友解释？他还是国家主席嘛。”“你们要求王光美到清华接受批判，为此我专门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王光美回清华，你们可以让她写书面检讨，背靠背的批判嘛。”回到清华，在大礼堂召开的大会上，蒯大富篡改周恩来的讲话：“周总理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不同意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斗，但同意把她揪回来批”。我上台去和老蒯争吵了起来。参加接见的总部委员有十多人，当时、以后、现在都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指证，我或老蒯究竟谁在说谎。

“智擒王光美”的“1·6”事件，当年《井冈山报》发行了数十万份，“捉鬼队”把他们的战绩宣传得沸沸扬扬。他们利用的践踏的是刘少奇、王光美夫妇对女儿的爱心。王光美被抓到清华，受到侮辱，面对暴行她侃侃而谈、不卑不亢，反而得到师生内心的敬重。那天晚上天刚黑，王光美被绑架推拥在西大操场体育馆的观礼台上，台上台下是黑压压的围观群众。我和周恩来总理的秘书孙岳通过电话，冲上观礼台去传达总理的四点指示，看到王光美被人推搡着，鞋掉了一只，头发零乱，竟能让我见到人性到了绝望处的微光。许多年后在深圳，老蒯和我聊起那天晚上，放王光美回去之前，蒯大富去见王光美。老蒯问：“你认识我吗？”“不认识”。老蒯自得地说：“我就是你要批倒斗臭的蒯大富啊。”王光美赶紧站起来要和老蒯握手，被老蒯拒绝了，“我怎么能和这个臭婆娘握手呢？”我不无调侃地对老蒯说：“所以她后来通过陈希同把你赶出了北京。”这种充满小鸡肚肠的阴谋伎俩，称得上光明正大的政治斗争吗？从这事件后，我明显地感到，蒯大富的心中已不再有阳光。

1967年4月10日的批斗王光美大会是经过中央批准的。周恩来的退让，说明中央对刘少奇斗争的升级。后来老蒯对我们说，给王光美穿旗袍、戴乒乓球项链，不知是哪个小子的鬼主意，不过挺解气的。这个30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被挂上打了×的黑牌子、跪在主席台前的“黑帮分子”，包括彭真、刘仁、叶林、蒋南翔等各级干部有300人之多，他们都和清华文革有关？真的是必须置于死地的仇敌？杀人不过头点地，以革命的名义对政敌极尽羞辱践踏之事，难道不应该深刻反省吗？你老孙就坐在主席台上，我很想在《拷问》中看到你当时的感受和今天的认识，你让我失望了。

刘涛是刘少奇和王前的女儿，跟着工作组干过错事。刘少奇垮台了，蒯大富用工作组修理他的方法修理刘涛：你不是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吗？现在毛主席说刘少奇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你若不和刘少奇划清界线，不站出来揭发批判刘少奇、王光美，就是反对毛主席。1966年12月江青还专程到清华找刘涛谈话。随着对刘少奇斗争的不断升级，刘涛面临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最齷齪的中国成语叫“大义灭亲”，它挑战人性，制造人格分裂。在这里我要说几句题外话，我们工化系工作组的副组长张茜薇是革命烈士张太雷的女儿，也是邱心伟同学姑姑的亲家。有一次我请邱心伟领我去见见张茜薇，邱心伟说老太太身体很不好，只要有人提到文革、清华就全身痉挛。我不知道她受过何种刺激，至今心灵的拷问、煎熬还折磨着她。我们这些人都干过错事、蠢事、需要用一生为青春埋单，去自我救赎。

在打倒刘少奇的大戏中，还有一段重要的插曲，就是陶德坚的“红教联”为陈里宁翻案的事情。陈里宁恶毒攻击刘少奇，因为有精神病被关在北京安定医院里。“红教联”和“井冈山”等四、五个群众组织把他抢出来，让陈里宁到处做报告，还将他的事迹编成话剧《新时代的狂

人》到处演出，大量印发《新编“狂人”日记》。并于1967年1月6日晚组织百余人冲击公安部十三局档案室，抢夺陈里宁的档案。在群众和荷枪实弹的守卫对峙的紧张时刻，惊动了周恩来，周恩来令守卫让陶德坚听电话，最后让她带走了陈里宁的档案。为陈里宁翻案，就是为打倒刘少奇造势，为给刘少奇定案增添筹码。陶德坚只是土建系的普通教师，她怎么知道陈里宁并这么感兴趣的？她怎么找到安定医院和公安部十三局这个保密单位的？她如何下决心挑头去抢档案的？为什么也挑选了1月6日与“智擒王光美”的“捉鬼队”同时行动，让周恩来无法兼顾？陶德坚死也不说，在她的《风雨人生》中并没有临终忏悔。诡异的是陈里宁不仅狂批《修养》，也批判《毛选》。批准逮捕陈里宁的人正是老蒯的“铁哥们儿”公安部长谢富治。“窥渊鱼者不祥”，陶德坚惹火烧身自是难免。闹剧收场了，陶德坚当年就受到批判。最后还是老蒯的“团派”保护性的把陶德坚看管起来。

我的这些认知，也是来自于陶德坚临终前的自传《风雨人生》。带着诸多疑问，2011年的某一天，我邀上蒯大富拜访了罗征启。虽说陶德坚对分管过土建系工作的罗征启十分反感，但对罗夫人梁鸿文却有好评。在罗征启的办公室里，我们三人喝着上好的铁观音，聊了整个下午。陶德坚的自传、照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美丽聪明、务实自信、肯干能干、坚强而不落人后。陶德坚在香港长大，外祖父娶了七、八房姨太太也没有养出一个男丁。陶德坚的父亲出身贫寒，因长相英俊、学业有成而入赘陶的外祖父家。陶德坚是家中的大小姐。刚解放她就只身北上求学，被铁道学院录取，开始了她在北京的大学生活。在与该校曾经是地下党的一位干部若有若无的恋爱关系中加入了共产党。院系调整后该校迁唐山，陶德坚进清华土建系。每一个人都自带风水命数，每一步选择都在决定人生际遇。陶德坚急于成功的取巧心态大于追求进步的理想；她成了政治运动中的弄潮儿，却迷失了本来应有的政治信仰；她受到母亲、丈夫、女儿的深爱，而她却似乎只爱自己；对共产党、“井冈山”、“红教联”这些和她相关的组织并无认知和认同。陶德坚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工程技术人员，也不象痞子，却在清华文革中成功地出演了一个痞子的角色。陶“大小姐”是一个十分自我的人，和老孙有太多太大的不同。奇怪的是孙怒涛在《拷问》中，说他的“怒涛战斗组”和“红教联”是“一路货色”，陶德坚和孙怒涛一样都是组织上眼中的“差质生”，而其实陶德坚“是一位很优秀的女同志。”以“大小姐”的傲气，定然不会对老孙的巴结认同承情。

## 2、为了权力，排除异己、制造分裂

“井冈山兵团”成立，没有经过任何程序，总部筹备委员就成了总部委员。蒯大富志得意满，任人唯亲，唯我独左，怀疑一切，自我膨胀。他编出了自我吹嘘的《蒯大富大字报选编》，同学戏称之为《蒯选》。有权有钱的老蒯下令，一下子印了50万册。江青为此批评老蒯：你蒯大富也太狂妄了，我还没出选集，你倒先出了。由于江青的干预，《蒯选》发行量不大，存世就更少了。1967年1月唐伟、沈如槐和宿长忠、孙怒涛、陈楚三、刘万章等人先后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内的“毛泽东思想纵队”、“八八纵队”、“天安门纵队”、“东方红战团”和“中央警卫团”，“五纵队”要求总部整风。1967年1月4日陈育延贴出大字报：“唐伟同志在个人主义的泥坑中是不会有作为的”，尤其是朱德明在整风大会上发言：“要用100度的开水给蒯大富洗澡。”大规模的“反唐战”开始了。刘泉说：“唐伟是机会主义者、是叛徒、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言人，想煽动群众分裂，整垮‘井冈山’总部”。“在我校，对待‘井冈山’的态度就是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的分水岭。”蒯大富说唐伟是“托派”，是“挂着红布条的小地主。”“八八”的建立是刘、邓、陶的一个大阴谋。陈家国在大会上拿出半年前记的日记，历数一些“蒯派”人物在工作组压力下的投降、软弱，包括刘泉反蒯的大字报。“反唐”暴露了造反派头头们自伤自残的真实嘴脸。由于中央文革的干涉，老蒯也发现“大方向错了”。“反唐”嘎然而止。

蒯大富“反唐”的本意是搞臭唐伟，搞臭“八八”，争取更多的师生臣服于“蒯派”的杰出

代表蒯大富；给那些敢于和蒯大富作对的人一个教训。事与愿违，“反唐”的结果是老蒯制造了更多的反对派，这也表明了“井冈山”内部深刻的裂痕，清华团、四两派的雏形已经形成了。孙怒涛旁观者清，在《拷问》中写到：“同样的体制，同样的理论，同样的路线，会做同样的事情”。“手握大权以后，以敌对阶级的代言人、代理人的罪名，清除异己，消灭盟友，建立极权专制，都是一样的行径。”这段话极有见地。1966年10月以后，周恩来多次提醒我们：“当你们这些红卫兵小将受压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你们会犯错误，现在你们开始掌权了，到了你们犯错误的时候了。”我那时就曾发奇想，很想问一问周恩来：“周伯伯，是不是你们老一辈革命家掌权后就开始犯错误了？”只是胆量不够大，也没有合适的机会，腹诽而已。工作组的副组长、冶金部副部长、辽沈战役的大英雄周赤萍，在清华主席台上的表现太让师生反感了，活现了“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势者将学校踩在脚下的丑态。

群众组织内部分歧的深层次原因，是对文化革命进一步展开的诸多疑惑。刘、邓、陶铸台了，下一个该打倒谁？康生？陈伯达？周恩来？中央文革？“穿军装的刘邓路线？”都在被怀疑、被炮打的名单之中。造反派的“坏头头们”像进了赌场日渐红眼的赌徒，唯恐右倾而不能立新功。蒯大富没有闲着，他也要先安内、后攘外。有了派系一统，就有了号令清华的实权；有了“中央文革”的支持和点拨，就有了“毛泽东思想的解释权”。“反唐”不对，但为了“实权”和“虚权”，都是必须的。那个干了错事、坏事须自责、道歉、悔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内疚只是中了黑《修养》的毒才会有表现。

### 3、抓“联动”等，参与对中学生的迫害

毛泽东未必懂得“蝴蝶效应”，但宋玉的《风赋》却烂熟于胸：“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红卫兵一出现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就引起了他的关注。他的一封信把这帮决心“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狂热青年学生捧到了天上，通过八次大接见、大阅兵，红卫兵成为了运动，成为了全国造反学生的代名词。通过不须花钱的“大串连”、“走新长征路”，这股洪流浩荡喧腾，“蹶石伐木，梢杀林莽”，助他实现了“天下大乱”的丰功伟业。红卫兵运动的思想基础是“继续革命”的“血统论”，也就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所谓“右派”，就是“黑五类”、“黑八类”、后来还加上“臭老九”。红卫兵运动一开始就带着“八旗子弟”血统高贵的蛮横，“义和团”暴民的愚昧，还有着“党卫军”冲锋队员的不可一世的残忍。暴行在“红八月”里达到巅峰。

周恩来为了保护知名人士，支持成立了“首都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简称“西纠”，东城区的高干子女少一些，随后也成立了“东纠”。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在《实话实说西花厅》中回忆说，“周总理支持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曾派国务院副秘书长周荣鑫和纠察队联系，指导他们的活动，动员他们尽力把混乱的局势稳定下来。”“最初中央文革小组也不反对它的活动。”“江青想要拉拢他们，故意和他们套近乎”。“8月31日，林彪还曾戴着‘西纠’的红袖章参加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活动。”事实上纠察队按国务院办公厅的指示把极少数知名人士保护起来，在街道居委会和街道派出所的安排和挑唆下抄家、打人不误，恐怖和血腥依旧。

“西纠”、“东纠”的崛起，刺痛了清华附中卜大华等“老”红卫兵的自尊自大：他们算老几？居然骑在我们头上纠察我们？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101中学等海淀区的红卫兵骨干发起成立了“联动”——“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联动”独领风骚，“西纠”、“东纠”中的父母级别不高的“红五类”子女立马贬成了“土联动”。“联动”矛头是对准中央文革小组的，尤其看不起“戏子”江青和“十七级大干部”戚本禹。“联动”没能猖狂多久，“红司令老毛”轻轻一挥手，“联动”就惨遭围剿。

清华“井冈山捉鬼队”充当了打人抓人抄家的重要打手，北京体育学院成了临时看守所，

那帮四肢发达的体育尖子成了最趁手的帮凶，谢富治把持的公安系统给予了全力配合。那些父母已经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弟，在阴谋阳谋的搏杀中终于输光了全部政治资本，在“上山下乡”之后，就一蹶不振地一一废了。

一位女一中初三班的学生在当年给我的信中写到：清明节，我被体院的王八蛋莫名其妙地关进了局子里。1967年4月22日晚上，我们由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人员接见后“大赦”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总理曾说：“你们这些人中也许有的人父母被斗了，被打倒了，他们不跟主席走了，你们还跟吗？党和国家会抚养你们的。”顿时掌声雷鸣，被接见的我们全哭了。我回到家以后父母都没说我，只是爸爸在第二天早上上班前，给我留下一个条，叫我好好闭门思过。

我的一位“捉鬼队”的同学，一次闲聊偶尔谈到当年抓“联动”事情，脸上不无自得。后来我看要宝忠的《蒯大富传》，讲到叶志江带人去抄邓拓的家、抄调查部长孔原（“西纠”头头孔丹是许明、孔原的儿子）的家。再翻看了叶志江相赠的大作《走出文革》，书中对此事并非只字未提，只因自己粗心眼拙而失察。后经叶公友情提示，果然在第126页中找到了数百字的叙述，叶志江也承认“这毕竟是一种侵犯人权，无视法律的行为。”我再次向叶公道歉，并修正看法：如何教我能不相信他走出了文革？“没有一滴雨水认为是自己造成了洪灾。”释放“联动”分子那天，江青特意抢到周恩来之前放人示好，她也害怕得罪太多的军中大佬。周恩来雷霆雨露皆恩来，三言两语就收伏了这帮天真可爱的“小魔头”。只是至死难悟的蒯大富及“捉鬼队”，从头到尾被毛江夫妇当枪使，惹上了杀父夺妻断子绝孙的家族血仇，无缘无故得罪了无数的“红色豪门权贵”，通俗点叫犯了江湖大忌。老蒯到底是农民的儿子，至今还傻傻地检讨自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没干好”。去年校庆后，清华附中的几个朋友请我吃饭，我把老蒯也邀请上了，由于事先没给主人打招呼，见面后两位男主人还给面子，两位女主人当下就脸色不好看了。老蒯讪讪吃罢，中途离席。女一中那位朋友曾告诉我，当年北京西四“九三学社”所在地是“西纠”总部，院子里养了两条狗，一条叫“戚本禹”，一条叫“蒯大富”。“西纠”的“国防绿”们抄家打人回来，不是踢“戚本禹”几脚，就是揍“蒯大富”几下。“蒯司令”从此恶名远播，血仇难消。老蒯若没蹲满17年大牢，定难过上如今安稳的生活。

#### 4、反军乱军，还是为了权力

1966年12月“井冈山兵团”成立没几天，蒯大富就派人去抄了徐向前元帅的家，把徐元帅的保险柜弄到清华。我参加的最后一次总部会上，蒯大富安排人连夜把保险柜运往天津用氧气割开，还说周总理下令归还保险柜的指示出了北京就不好用了。这件事似乎后来无人追究，我曾当蒯大富的面指控过他，他却没事的人一样。那么多人参加总部会，参加抄家抢劫的人也不会少，几十年来也没听说有人揭露这件事。1967年1月11日徐向前在全军文革小组改组后还担任了组长。蒯大富当时为什么这么干？为什么敢这么干？抄来的东西给了谁？蒯大富曾将刘志坚抓到清华，关押在1号楼506房间。鲍长康曾持关锋指令窜到北海舰队。

蒯大富反军乱军的手段，不同于各地极左组织和“三支两军”部队的冲突，蒯大富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挥下，锋芒直指军中德高望重的老师、老将。根据文化革命的纲领性文件《5·16通知》的精神，“穿军装的刘邓陶”就是第二个被打倒的目标。1967年7月蒯大富在他召集的“全国造反派头头形势讨论会”上发言：“下一年的战斗任务就是专门解决各大军区的军权问题。”

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受中央文革差遣，去四川揪斗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彭德怀元帅，地院的红卫兵捷足先登，抢在北航之前将彭元帅弄回了地院。地院的头头朱成昭是一个人格健全、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他和囚禁中的彭元帅几番长谈下来，得出结论：彭德怀是正确的，毛主席错了。彭德怀在地院没有受到折磨，让江青心中不爽。江青指使韩爱晶挑起了一场

北航“红旗”和地院“东方红”的武斗，韩爱晶趁乱把彭元帅抢到了北航。韩爱晶下令不许任何人与关押在地下室的彭元帅谈话，不断地批斗、不断地折磨他，还亲自动手彭元帅的耳光。韩爱晶的好友告诉我：韩爱晶在给中学老师的信中，对彭元帅充满敬意。就这么一个不缺少见解却毫无人性、人格的“红卫兵领袖”，不仅受到毛泽东称赞，说韩爱晶是“一个有希望的人，”也得到了当年仅一面之缘的“4 1 4”二把手孙怒涛的信任和吹嘘。在深圳饭局上，凡是见过韩爱晶猥琐表现的清华校友，都为你老孙推崇韩爱晶的美言和相信韩爱晶的谎话而感到脸红。

清华百年校庆前后，蒯大富给我看一条韩爱晶发给他的短信：“毛泽东有错误，也整过我们，但是我们对毛永远也恨不起来。有时想到主席，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我问老蒯，你相信老韩还为谁能流出真诚的眼泪吗？老蒯一笑置之。

“揪军内一小撮”止于武汉“7·20”事件。在这个擦枪走火就能引发“辛亥革命”、终结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伟大城市，中央文革那几个“小爬虫”终于激起了工人、军人的巨大反弹，荷枪实弹的军人步伐迫近了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从来不坐飞机的毛泽东匆匆离开武汉飞往上海。他自己点燃的野火，猛然窜到他的身边，几乎灼伤他的皮肤，他就一定能控制住所有的老军头？闯了祸的陈再道跟随周恩来到北京，没听说受了处分；风头正劲的王力、主持全军文革的关锋，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取王、关、戚政治生命以安军心，毛泽东要这种小手腕，只在一念之间，用不着精心谋划。

毛泽东从“5·16通知”的部署掉头而去，蒯大富被“放了鸽子”。“井冈山”对外作战部又该向谁开战？军事动态组收集的材料如何处理？设在全国各地的反军联络站如何收场？蒯大富失去了方向和目标，也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1967年8月16日周恩来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年出去是对的，今年就不是时候了，帮了倒忙。”几天后，王力、关锋倒台了。这是老蒯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之前，老蒯干什么对什么，尽管行事下作、手法卑鄙，大方向总是正确的。这之后，老蒯干什么都不对了，他成了给无产阶级司令部添乱的“小混混”。

## 5、挑起武斗，下令开枪使武斗升级，双手沾满鲜血

1967年4月10日，蒯大富沉浸在主楼广场30万人批斗王光美带来的风光无限的喜悦中，以“纵队派”为主的反蒯力量自发地汇集成了一个足以与之抗衡的派别。1967年4月14日，一个以干部问题为论战焦点、以反对蒯大富独霸清华权力为目标的“4 1 4总部”成立了。蒯大富通过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控制的明斋广播台，撕毁三总部联合协议，组成了一个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拒绝监督的强权机关，逼走了唐伟、朱德明、许胜利；掌握权力的蒯大富唯我独革、野心膨胀、任人唯亲、排除异己，逼出了“纵队派”，逼出了“4 1 4”。工作组“反蒯”，是强权压制民主；“4 1 4”反蒯，是反对蒯大富的专制。“井冈山”总部委员孙怒涛、王良生等相继参加“4 1 4”，蒯大富用他的强权培植起了一个秉承公道正义的强大对手。对于广大的师生员工来讲，求得安全、避免恐惧，远胜于对权利的追逐。

周恩来是何等聪慧精细的人物，他长于未雨绸缪、枉尺直寻，总能棋高一着化解危局。他痛斥蒯大富“智擒王光美”的卑劣伎俩。对于蒯大富这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毫无信誉的权迷，周恩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在清华革委会成立大会召开仅仅几个小时前的凌晨寅时，他通过谢富治宣称不能参加大会，还建议大会延期。“团派”暴跳如雷，老蒯重重地“闪了腰”。尽管周恩来曲意逢迎毛泽东、谄侍江青，领衔“刘少奇专案组”组长，遭人诟病，却能时时处处表现出是无奈的违心所为。总之，老蒯对于这位最早为他平反的恩人尽管恨得牙痒，却从来不敢公开挑衅。去年4月韩爱晶的《清华蒯大富》问世，封面上的照片竟不是“爷爷一样”的毛泽东，或最疼爱他们的江青阿姨，而是老蒯就教于周恩来的照片，我以为这两个脑瓜灵光的家伙是慑于周恩来的人格力量。

1967年5月30日清华大学革委会流产，毛泽东说的“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成了老蒯眼前晃来晃去的画饼，也成了蒯大富终生抱憾的清华情结。

“414”成立不到一年，人数发展到7000，足以抗衡老蒯的“团派”。进入新年，66届的同学毕业分配离开学校，两派抢地盘、划分势力范围的争斗愈演愈烈。1968年3月27日北京大学发生武斗，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打跑了对立面“北大井冈山”，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表态支持聂元梓。蒯大富从中受到启发，决定通过武斗打垮、打跑“414”，实现独霸清华的野心。所以我指出老蒯是清华武斗的挑起者、责任人，老蒯对此指证供认不讳，多次在同学面前说：“如果我当初不同意打，（清华武斗）肯定打不起来。”

清华武斗从1968年4月23日开始，1968年7月27日结束，又称之为“百日武斗。”两派的冲突从4月23日的“旧电机馆战斗”到4月26日的“8号楼战斗”、“2号楼战斗”，4月29日“414”“百人抢粮”，5月2日“土木馆战斗”，发展到近千人参加的“5·30大武斗”。血淋淋地演了一出毛统帅倡导的“文攻武卫”的大戏，遵从他的教诲将派别之争演变成了“国共两党的斗争。”“5·30大武斗”之后，冷兵器过时了。老蒯下令开枪，而且是五支同样的步枪瞄准同一个目标开枪，以逃避法律的惩处和良心的谴责。老蒯还下令格杀凡是走近科学馆的人。想到那些在武斗中无辜死去的鲜活生命，我们是否应当象鲁迅一样“出离的愤怒，”写出一篇又一篇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414”没想到自己这一派竟然能支持这么久，架在主楼顶上的“九头鸟”高音喇叭，把播音员冯克庄铿锵有力的声音传到了数公里之外，可是科学馆成了“团派”包围下的孤岛。两派的头头和小兵都生出了一种无力感，武斗的残酷和血腥超出了双方的想象。有一次孙耘对我讲：当年若知道老四救出科学馆的人就打算撤出清华，真应该制止吴慰庭炸毁老四通往科学馆的地道，让老四跑了算了。陈育延是反对武斗的“鸽派”，打算脱离战场回家，5月19日施然路经老四防区，万料不到会被俘进了科学馆。蒯大富心中忐忑、不无悔意，却受到“鹰派”的巨大压力。5月30日“团派”火烧东区浴室时，陈继芳还曾从九饭厅提来两麻袋辣椒干倒在火里，后来见团派战友用手榴弹在水木清华炸鱼吃，心中受到刺激，回沈阳家中养病去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团、四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老邓的“宜粗不宜细”，陈云的“两派都不用”，成为了社会禁绝反省、抛弃公正的毒瘤。被染上这种病的人，再也无法坦然面对人生。

去年，正在编写《清华蒯大富》的韩爱晶，造出了一个他和地院王大宾在1968年5月30日后，受北京市革委会委托，到清华找沈如槐协调两派大联合，被沈如槐拒绝的故事。言下之意是“414”铁心武斗，沈如槐拒绝调解。韩爱晶为什么就不去想一想毛泽东那只翻云覆雨的黑手？江青肆无忌惮的挑唆？孙怒涛为此与韩爱晶核实，与陈育延探讨，网上电话过招二、三十个回合。其实事情并不复杂：如陈楚三分析，是老韩把1967年9月前两派联合的事情扯到1968年了。另一种可能就是老韩说谎。能够证实或证伪这件事的只有三个人：沈如槐、韩爱晶、王大宾。老韩说有，但说不准时间、地点、举不出任何佐证；沈如槐断然否认；王大宾在四川都江堰，老蒯去年还去见过他，王大宾至今保持沉默。我相信沈如槐的说法。清华武斗进入热兵器阶段，普通同学钱萍华都会死于狙击手的枪下，仅仅为了安全，坐阵主楼的头头沈如槐那时根本没有单独会见韩爱晶、王大宾而不为人知的可能。本以为在《拷问》中可以看到老孙的判断，老孙，你让我失望了。为此，我将去年给你的邮件附于后，以指出韩爱晶在说谎。

孙怒涛学长：

《育延有言》这篇文章上网同时，陈育延也发给了我。你同样执着和较真的态度令人钦佩。看到你的来信，我愿意谈谈自己的认识。

你为“百日武斗”中王大宾、韩爱晶到清华调停一事追寻真相，蒯大富、蒋南峰、陈楚三在泸沟桥小聚会上都有猜测和分析。聚会结束第二天，沈如槐在郭林酒家请吃饭，那天老沈沉着脸面对你的询问再次否认了这件事。然后是你、陈育延、韩爱晶、陈楚三的邮件往来。事件的中心人物三位：王大宾、韩爱晶、沈如槐。还缺少见面的时间、地点和经过。局外人争论下去，大家仍然一头雾水。任何断语和结论都有待证实。

为了还原事情真相，我们作以下分析猜想：在皇权专制条件下，战争是政权唯一的催生婆。在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不止一次要挟恫吓说，要“重上井冈山”，要去“找解放军”。清华武斗初起，毛江夫妇只是静观其变，“百日武斗”中也未有他们的表态，其他中央首长也视若不见。蒯大富泄愤打倒刘少奇、羞辱王光美，既受到了张春桥、戚本禹的教唆，也迎合了毛江夫妇的阴暗心理。把清华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是蒋南翔的老套路，也是蒯大富的新目标。只是一个跟着北方局，一个贴上了中央文革江阿姨。毛泽东的心愿是集神力、皇权、教主于一身，而老蒯是最好的信徒、打手、痞子。于是蒯大富未经任何程序便当上了首都“三司”司令、北京市革委会常委。毛泽东还说过蒯大富可以当清华大学校长。1968年7月28日他接见“五大学生领袖”时，仍然难以掩饰对清华“414”的厌恶和对老蒯的昵爱。1970年，蒯大富已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当工人，仍被指定为北京市人大代表。可见老蒯深沐皇恩、宠幸难衰。

清华两派之争，要害是清华大权落于谁人之手。蒯大富错在于是清华土生土长的学生，同学老师知根知底，运动中他的充分表现，失去了多数师生的支持。“414”是一个“反蒯”的大联盟，反对“痞子上台掌权”才是“414”的宗旨。武斗刚开始，蒯大富的恋人——清华附中刘刚就离他而去，到了陕北：“这个毫无道德底线的人政治生命完了！”

武斗进入僵局，蒯大富的投机心态促成了他行为上的首鼠两端，团派内部分化成鹰、鸽两派，如同“414”的“东方红”、“三七”两战团。以谢富治为首的北京市革委会、公安部，既要维护北京和全国的大局，又要偏袒蒯大富，派出一个有蒯大富参与的调解小组，促成一个以蒯大富为主的清华大学权力机构也是必然的选择。当时毛江夫妇并未表态，也许正在等待“414”落荒而逃，蒯大富的团派“打江山、坐江山”的结果，所以这些调解因缺乏威权而变得无足轻重。韩爱晶等人到清华调解不论是一次或是两次，都是真实可信的。沈如槐断然否认在清华武斗正酣时见过调解代表韩爱晶、王大宾也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沈如槐是否说过“拖也要拖死蒯大富”的狠话也不重要了。对蒯大富“这个双手沾满同学鲜血的刽子手”，“拖死老蒯”也算不上什么狠话。因为调解不是毛江夫妇的意思，双方师生的血债，让义愤如焚代替了理智思考。蝇头小利上作“蜗角之争”怎比得上英明领袖在祖国山河大地这张“白纸”上横涂竖抹的“伟大战略部署”呢？这“两小撮”“疯子”、“傻子”在打着工人旗号的“皇军”的扫荡下终于同归于尽了。难道四十三年后，我们还要再疯一次、再傻一回？忽然想起辛词中有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可谓一叹！

陈育延信的重点在讲述团派中的“鹰鸽之争”，在述说老蒯一度的大权旁落和内心的彷徨挣扎，在陈述一些多数老团、甚至团派总部委员也不知情的重大事件。坦陈史料是需要明智和勇气的，有如李自茂。时至今日蒯大富已被判刑服刑释放出狱，已用不着为他推诿罪责，他的认识局限出于封建愚忠，至死难改。所有的文革肇事者也已度过了法定的20年追诉期。那些在劫难逃的倒霉蛋，也许有幸成为在建的“封神榜”上人。那些依仗父母权势投机革命、寻求“终南捷径”谋取飞黄腾达，进而祸国殃民的人才是真正的蠹贼，愿他们继续追随贺鹏飞进入地狱，因从不知忏悔而成为万劫不复的孤魂野鬼。而那个最大的肇事者，那个“始作俑者”却从未被揭发，从未被清算，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面对还活在世上的十数亿中国人？

清华从来不是两派之争，第三派只是销声匿迹，从来没有散伙。三派中都藏有种种大奸大恶之人，即便回顾历史也不能被派性迷住了眼睛。

你我都没有参加武斗，都没有在场证实证伪的资格。就你而言，建议这场笔墨官司就此而

止。

中国传统文人尚重“全始终之德”，你作为“沈孙汲之流”的二把手，居然武斗不在场，让我至今疑惑。我也曾听到过你因没参加武斗而生出的憾叹，这种知识分子的软弱，出自贫寒的家世？出自旧文化的浸淫？出自内心的恐惧？十年文革的阴霾，难掩我们心头的阳光。

我们已不再青春，不再天真，也不再纯粹，但心中还有一丝阳光，也许就是希望。

唐伟 2011. 8. 27 于深圳

1968年7月27日，数万工人和军人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清华制止武斗。“414”如同见到救星，赶紧欢迎；“团派”如同见到外星人入侵地球，用子弹、手榴弹还击，造成5死731伤的惨剧。蒯大富仓惶出逃，和陈育延到西长安街电报大楼给党中央、谢富治拍求救电报，差点误了夜半后的“伟大领袖接见五大领袖”。老蒯也不想，这和上一年抓联动的手段与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情景有什么两样？那时的打手是谁？背后的黑手是谁？《拷问》中独具慧眼的孙怒涛看见了，“这次召见，414没份儿，连工人也没份儿。”“召见谈话中，毛泽东没有说一句对死难工人表示悲痛和哀悼的话，没有说一句对731个受伤的工人、解放军表示安慰和问候的话。”“当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的湖南厅里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的时候，那五个死难工人的躯体还没有完全冰冷，他们的亡灵正游走在黄泉路上。五个破碎的家庭，正在呼天抢地地哭喊着亲人的名字。”

毛泽东的历史观来自于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如斯大林所说：胜利者是用不着自我批评的。毛泽东的治国之术就是“外儒内法”的帝王术。“7·27”以后，毛泽东给“工宣队”送芒果，又是发指示，又是搞接见，尽管天象森严、天心难测，却也春风雨露、泽被万方。各行各业，各路精英，既受贿赂、利用，又被收拾、打压，无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老干部死去活来，终于明白了为官之道；中学的“小屁孩”被他捧得狂妄了，“上山下乡”也活该；大学的知识分子不可一世了，让他们尝尝当“臭老九”的滋味；工人阶级可以领导一切，就是不知道“下岗”以后生活怎么办；贫下中农“上、管、改”，“三农”问题堆成山……。林肯说：“一个人可以永远地蒙蔽少数人，也可以一时蒙蔽所有的人，但绝不可能永远地蒙蔽所有的人。”

“英雄真戏子，戏子假英雄。”7月28日的召见，是红卫兵领袖吃的最后一顿“板凳饭”，明摆着的卸磨杀驴、猫哭耗子，孙怒涛却看成了护犊心切、恨铁不成钢。糊涂地认为，“毛泽东没错，是造反派咎由自取，怨不得毛泽东抛弃的。象西安的李世英、北航的韩爱晶，在大联合方面都做得比蒯大富要好得多，也跟着倒了霉。蒯大富在“7·27”中的愚蠢举动，如一粒臭屎害了造反派一锅汤”。《拷问》中的这些分析，逻辑混乱、因果倒置，聪明睿智如老孙这样的清华“优质生”，认识上如此错位，囿于一己的得失之心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不真正揭露毛泽东，谁也讲不清文化大革命。

## 五、关于两派的理论

所谓理论，不是假设，就是总结。文化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历时十年，耗尽巨大国力和牺牲的实践证明，这个反人性、反人类的假设错了。文革发动至今四十多年来，我们天天企盼政治改革带来的思想理论建树，以完成“鸦片战争”以来，无数哲人先贤所憧憬的中国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辛亥革命、1949年建国，都没有为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开启通往文明富强的康庄大道。宣布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执政党的表现越来越令人失望，平庸怠惰、得过且过，谁不讨厌这种“开左灯、向右转”的虚伪生活？段子里总结说：“中国是一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一阵，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一阵；习以为常就行了。”反省文革、“整理国故”，是中国知识分子踏踏实实建设新中国的责任。



文革中，毛泽东的话句句是真理。毛泽东封了“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就是领袖了。周泉纘写了《414思潮必胜》，毛泽东调侃他是“414的理论家”。于是有人讲：“老团有领袖没理论，414有理论没领袖”。周泉纘此生添了心结，一度在名片上都印上清华大学学生、理论家的头衔，中了魔一样笔耕不已、潜心写作，十二年间，出了七、八本著作。两年前，韩爱晶在收集资料时，轻轻一挑唆，《414思潮必胜》的著作权出了疑问。罗征启含糊其词，然后沉默不语。万润南尖酸刻薄，说周泉纘“一个字都没写”，还被老毛一口痰堵塞心窍。周泉纘被点中死穴，对老师大暴粗口，完全忘记了自己还是本焕大师摩顶赐名的佛门弟子。李兆汉若未病逝，会站出来说什么呢？

《414思潮必胜》是周泉纘起草、定稿，罗征启、万润南、印甫盛、李兆汉等人修改而成的。1967年8月3日，周泉纘以“414东方红战团一战士”署名贴出大字报《414思潮必胜——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由于很少有人关注，周泉纘又化名写了一句口号：“看！《必胜》这张反动文章的矛头对准了谁？”贴出去后，仍然没有多少人有耐心去看。到了9月17日周泉纘、杨忌非贴出了一篇内容是炮打陈伯达的大字报，当天晚上，江青在接见“地派”头头的会上点名批评周泉纘说，有人欺负老实人，欺负到中央头上，“周泉纘是个小丑”。随后两个月中，周泉纘受到批斗和关押。周泉纘后来不无得意地对我说：“我不反陈伯达，怎么能成为清华大学最后一个造反派头头？”至于毛泽东说，414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纘，写了一篇《414思潮必胜》，说造反派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打江山的人为什么不能坐江山呢？周泉纘因毛泽东、江青点名批评而暴得大名，《必胜》这才终于引起了两派批判者的重视。

《必胜》从来不是“414”的共同认识，更不是“414”的纲领和理论，毛泽东说打江山、坐江山的那段话，据说也是张春桥看出来的文章深意。《必胜》还是一封情书，1967年周泉纘去河南郑州调研时，认识了“河造总”的一位漂亮女孩子，在那个泛政治的狂热年代，许多人忽略了这张大字报的副标题。今天的人会奇怪：原来情书也可以这样来写。

在毛泽东淫威日盛的文化革命中，一派群众组织没有、也不可能提出自外于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汲鹏说：两派坚持的理论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414在继续革命中更加强调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老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加强调继续革命。清华文革证明了这个理论的荒谬。高等学校的派斗发展到武斗，说明“破就是立”的破坏哲学走到了尽头。口水战、笔墨官司只会更加搞乱思想，根本不解决派性斗争中的任何问题。权力斗争日趋白热化，《必胜》成了清华文革舆论斗争中的收官之笔，反映了两派师生为人驱使、为人作嫁、为人替罪的无奈心情：革命已成强弩之末，专政必须加强。不被毛泽东看好的“414”，依附上了统治思想的制高点，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和宦海沉浮中却占尽优势。看看两派骨干精英从那时到今天生命轨迹，就是最好的证明。

张鸿庆说：清华文化革命是一场大戏，首尾最重要，中间只是过程而已。“清队”、“清理三种人”、“揪516分子”的同时“血统论”不断抬头，今天已发展进入到了“拚爹”时代：“爹是儿的通行证，儿是爹的墓志铭”。两派都不用，两派都成弃子。因为重用子女，至少不会被挖了祖坟。清华文革谁是胜者？谁笑到了最后？“八九”！

“红色贵族”万岁！

（未完待续）

□ 原载《记忆》第86期

~~~~~

【各抒己见】

## 《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自序

• 徐正全 •

天悠悠，地悠悠，文革纷争终难休。是非曲直凭谁定，夕阳西下水东流。

文革发生至今已四十六年，和古今中外一切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一样，当事人和后来者往往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各执一端，而且都能摆出并非虚构的事实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不足为怪，因为双方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来采集论据。双方都只注重文革中具体过程的对错，常常忽视了对文革历史必然性的探讨，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革，亿万群众为什么会舍生忘死、以命相搏地投身文革，为什么至今还有那么多黄土埋到脖子的文革亲历者九死而不悔。

人世间一切事情的发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墙上没个钉钉，就挂不住个瓶瓶”，何况这种牵涉到亿万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文革的发生，必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原因。毛泽东不是心血来潮，投身文革的几亿人也不是疯子，什么权力之争、个人恩怨、群众愚昧狂热，不是扯淡，起码也是浅薄。文革发生自有它的历史和现实的必然性，所谓必然，就是一定会发生，人民改善和变革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不以文革这种形式表现，就会以“武革”或其他什么革的形式表现。文革是以毛泽东的错误发动造成的吗？不对。毛泽东只是使文革发生的时间提前了，毛泽东看到了发生文革的必然性，与其让它自行爆发而导致无序，不如主动发动而将其纳入有序。这正是毛泽东的英明和雄才大略。

文革一开始，就大张旗鼓地宣传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试问建国以来，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哪一场不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呢？可是，又有哪一次出现过亿万人舍生忘死地自觉参与？没有，一次也没有，除少数运动积极分子外，广大群众用现在的话说，是“被参与”。发动发动，他发还要我肯动啊。文革则不同，各行业、各阶层群众，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投入，包括保守派。运动初期，“十六条”规定工厂的文革按原来四清的部署进行，各地工人造反派为争得参加文革的权利，冒着被当权派打成反革命的危险，或冲击各级党政机关，或静坐，或切断铁路，或上京告状，殊不知当时离开工作岗位将被扣掉赖以养家糊口的微薄工资，他们也置之不顾。工人造反派要求和学生一样参加文革，是因为他们有话要说，有自己的诉求，尽管是很朦胧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文革就是人民的文革，就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不然那些造反的工人真不会拼死拼活非要参加。

建国十七年来，人民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仅仅停留在理论上。生活水平提高，那也是宣传超出实际。一个不可避免的现实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被各级当权派歪曲成为欺压人民、巩固和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有力工具，在阶级斗争旗号下开展的所有运动，几乎都会被当权派变着法地把矛头指向群众，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任何一个当权派都可以以“党”、“组织”自居，把人不当人，一个小当权派不经意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甚至一批人一生的命运。经济生活上高积累、低消费，广大群众长期清贫。这一切使得官民矛盾越积越深，几乎没有缓和的可能。根本原因在哪里？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各级管理者就单个人而言，绝大多数不是恶人，而是有良知的人，看来还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全面评价文革前的国家体制，我没有那个能力，我只能说一说自己的切身体会，比如说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离不开的“组织”。中国人民高度的组织化，中国政府堪称世界一流的社会动员能力，或许是中国这样的国家走向现代化所必需的。但这个组织实在是太强势了，你离开组织就是自己找死，农民遇灾外出讨饭都要到公社、大队开证明，否则做叫花子的资格都没有。

各级各类组织的当权派一旦放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形成了人民对他们的人身依附。这样就很好理解，为什么广大干部对其上级抱定“宁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的宗旨，为什么保守派群众死心塌地跟着当权派跑。

保守派群众对组织的依赖程度比造反派深，对组织的无边法力有着比造反派更深切的体会，紧跟领导几乎是他们的本能。一月风暴来临，造反派没怎么冲击，保守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这是因为那时当权派或自顾不暇，或躺倒不干，不能再以组织名义操控他们，他们就成了无头苍蝇。同样是这批人，二月逆流一起，有军人做后台，他们就极其迅速地重新集结起来，而且强悍无比，杀起人来毫不手软。无论是打倒刘少奇、打倒林彪，还是打倒四人帮，举国上下一律热烈欢呼。有人说这是中国人的劣根性，只知向权力献媚。这固然不错，但绝不是中国人生得贱，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组织行为，一旦与组织对抗或离开组织，生存都成问题，你可以什么都不要，但不能不要命不要生存。

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孕育出一个官僚资产阶级是必然的。毛泽东洞察其致命弊端，给全党定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治国归纳为治吏，这就是说，国家对人民是服务、效劳，对官员是治理、整治。老人家希望用这个宗旨来奠定执政党和人民的公仆和主人翁关系，确立这个政权的性质。遗憾的是，老人家至死也没拿出落实这个宗旨的制度，其实老人家就是制定了这个制度，人一走也会成为一张废纸。文革的努力分毫没有触动现存制度的弊端，文革结束后官僚资产阶级疯狂地反弹报复，反倒使这个制度的官僚性空前强化，人民性消失殆尽。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现行制度的弊端不改变，它就是孕育下一次文革的温床。政府必须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对政府天然合理的要求，更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政府一旦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应该垮台了。造反派为什么造反，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弊端造成的。造反从古至今可都是提着脑袋玩命的勾当，兔子不被逼急了不会咬人，说穿了文革就是官逼民反。当下老百姓对“组织”的依附减弱了，当局如果在制度设计中真正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那倒是在向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回归，起码可以延缓他们梦里也怕的文革再次发生。不过我对这种回归不是很有信心。

我出身贫寒，初中都未毕业，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像我这样的中国老百姓，人生平淡无奇，本无任何意义可言。正是文革，使我们毫无意义的人生有了那么一点意义，让我们真正做了一回人，当了一次自己的家。虽然过程是那样令人心酸，时间又是那样短暂，我们付出的代价又是那样沉重，但这是我们人生中唯一的亮点。我们参加文革，一不为当官，二不为发财，是为了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虽败犹荣，赤诚之心，天地可鉴。这就是文革对我、还有与我类似的人的意义，这也是我们至今不悔的原因。现如今掌握话语权的人全面否定文革，连我们人生中仅有的一点意义也要剥夺。当然这也无关紧要，这个意义在我们心里，与别人的话语权无关。

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967年七二〇事件后我们新一治工安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21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治工安公司分部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治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〇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〇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另外，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判决不顾事实、别有用心、显失公正。我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张治能虽在现场但没动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管当局和一治当权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个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张治能整下去。我确实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头头就有责任；二是我就在现场，制止得再坚决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这个判决按当时的法律也是极不公正的。

判决不公，是一个法律问题；走资派横行无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的问题能抹掉我自己的问题吗？我在此案中的罪责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吗？

王师傅被打死，为什么？谁之罪？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归罪于文革，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间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组图“全球街头上演的争议‘私刑’”吧，看一看美国吧，马克·吐温曾经斥责美国为“美利坚私刑合众国”，现今击毙误入私人领地者仍然不负法律责任。在新中国，无论是文革前，还是现今“太平盛世”，民间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样发生。说文革时期特殊，哪一个时期不特殊？不特殊怎么会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把文革期间的民间私刑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什么领导责任，什么社会氛围，什么主流舆论，还可以找出一千一万条理由为施私刑者开脱，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施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爱别人的生命。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重的话——“禽兽不如”，就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禽兽爱护他者生命的事实，也知道禽兽的残暴，但禽兽的残暴并没有超出生存所需的范围。而人的残暴程度、范围却能够无限扩大，这一点上人真不如禽兽。

王师傅在“新一治”的手里失去生命，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完全能够体会、理解王师傅的亲人、朋友，一治的一些职工对我们的仇恨，我们应该向他们忏悔。希望我们毕生的真诚的悔恨能够一点一点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仇恨。

尽管这一事件事出有因，但不能成为暴打王师傅致死的理由，也不能减轻我们的罪责。王师傅当时没有可能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没有任何反抗能力；同时没有任何人要求我们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胁迫我们必须这样做，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样在我们的拳脚下消失了。在对一个手无寸铁的人大打出手的时候，社会和父母从小就教给我们的“人命关天”，文革以来中央一再强调的“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说过的“人是最可宝贵的”，统统忘到九霄云外。铸成如此大错，谁也怨不得，怨自己。

上面拉拉杂杂说的这些，是我在写这本书时想得最多的问题，一是我对文革发生历史必然性的认识，二是我对王荣炎师傅之死的基本态度，就以此作为开场白。

□ 原载《雪地足迹：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 页：//www.cnd.org /

---